

第一节 学一点文字学

在声光化电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文字仍是最重要、最便捷的代语工具。要熟练掌握一种文字，尤其是音义繁重的方块汉字，非下一番苦功不可。在此过程中，学一点文字学知识，苦干加巧干，可能效果要好些，对学习者来说是这祥，对教学者来说就更是这样。不但如此，学习、研究文字学，对于促进语文规范，促进语言史研究，乃至促进社会史、文化史研究，都有重要作用。现在让我们就这个话题稍微展开地谈一谈。

一、促进读书识字

要读书，必须先识字，这似乎是一般的常识。可是识字有两种办法，一是一个字一个字硬教硬学的“识字块”的办法，计日程功，三年五载之后识的字多了，慢慢也就解决了读书问题。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在识字的同时，还要学一点文字理论，了解一点六书结构和文字发生、衍变的常识，这样学习起来自然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成效。如果是从事识字教学，还必须更上一层楼，具备更加广博的文字学理论和实际知识，从而才能从根本上提高识字教学的成效。比如文字代表语言，又紧紧地依附于语言，而一个正式学识字的孩子一般总该有六七周岁的年纪，在说话上基本已经过关，这时就应当利用他们的说话能力去促进其认字能力，这就是有名的“注音识字，提前读写”识字法的实验 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语文现代化》1985年第8辑称：

黑龙江省一市两县三个小学的一年级班从1982年新学年开始，进行了“注音识字，提前读写”的小学语文教学的改革实验。一个学年后，实验班的佳木斯三小一年级一班40人，人均识字1064个，人均默字692个；拜泉县育英小学一年级一班40人，人均识字1155个，人均默字763个；讷河县实验小学一年级一班40人，人均识字1023个，人均默字726个。按照《小学语文教学大纲》规定，第一学年只要认识700字，实际要求四会的350字。

同刊1990年第10辑称，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也进行了

类似的试验，据吉首民族师范附小 1985 年 6 月底测查：

项 目	人 数	人均阅读量（万字）				人均识字量（个）				
		一年一期	一年二期	二年一期	三年级	一年一期	一年二期	二年一期	二年二期	三年级
二年级实验班	41	5	10	50		256	878	1290	2454	
《大纲》规定识字量						290	700	1170	1700	2500

按：该班学生中土家族、苗族学生占 60% 左右。

如果没有教育学、心理学、语言学等多学科的理论武装，这项实验的开展和成功是不可想象的，而从实验的成功又能看出：一方面，从产生来说，文字虽然来自图画，但主要依附语言并代表语言；另一方面，从学习和运用来说，也要尽可能让它依附语言并代表语言。在这个“以阅读带识字”的实验过程中，一个关键性的因素是《汉语拼音方案》，从而证明拼音文字代表语言确实更为直接和简便，尽管拼音方案还不就是拼音文字。

现代语文的学习如此，古典文献的学习就更是如此，因为文字误认、六书不讲而闹的笑话比比皆是，有时为解决古书中的一个难点，甚至需要音韵、训诂和文字学方面精深而又渊博的学识。我们约举数例：

例一：

《说文》：“罪 捕鱼竹网。”司马迁《报任安书》：“此人皆身至王侯将相，声闻邻国，及罪至网加，不能引决自财。”文中“罪”字与“网”对文，正用其本义。可是，毛郑解诗皆已不识此义。《诗·大雅·瞻印》：“罪罟不收，靡有夷瘳。”

毛传：“罪罟，设罪以为罟。”郑笺：“施刑罪以罗网天下。”以当代通用之“罪恶”“刑罪”义释之，未免迂曲难通。（例见刘又辛、李茂康《训诂学新论》）。

例二：

朱骏声在《说文通训定声》“随”部“隋”字下说：“按隋杨国号本作随，讳_之用隋，而反为裂肉，亦非吉语。盖六书之不讲久矣！”

按《说文》释随为从，本无贬义，相反，《易·随》：“随，元亨利贞，无咎。”郑云：“天下之人咸慕其行而随从之，故谓之随也。”然则“随”字实有随顺无咎之义。“隋，裂肉也。”裂，桂馥谓当作“烈”。不管为裂、为烈，一为骨肉分离，一为燔烧牲肉，均非吉语，故朱氏致讥焉。

例三：

《旧唐书》一二九“张延赏传”附张弘靖：“今天下无事，汝辈挽得两石力弓，不如识一丁字。”

由此而产生一个常用成语：目不识丁。但推敲原文，这实在是误会。“丁”字既不是笔画最少，也不是格外形象，何缘提出它来作为识字的阶梯？细按原文，当是“个”字，因与“丁”字形近致混。原文“挽得两石力弓”同“识一个字”两相对待，“石”同“个”均属表单位之词，只有这样理解，才觉文从字顺。

唐代使用“个”作单位词了吗？答案是肯定的。《说文》：“箇，竹枚也；从竹，固声。”戴侗《六书故》引唐本《说文》：“或作个，半竹也，象形。”例如：

《国语·吴语》：“譬如群兽然，一个负矢，百群皆奔。”

《荀子·议兵》：“负服矢五十个。”

《史记·货殖列传》：“木千章，竹竿万个。”《索隐》：“箇、

个古今字也。”又引《释名》：“竹曰个 木曰枚。”

到了唐代，使用得更加普遍，如杜诗：

两箇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砧响家家发，樵歌箇箇同。

然则笑话别人“目不识丁”的高人雅士，他自己恰恰念了个别字（参见《新辞海》）

例四：

《诗·豳风·七月》：“八月剥枣，十月获稻。”毛传：“剥支也。”

这本来没有什么疑义。可是，《容斋随笔》卷十五“读书难”条记载：

“八月剥枣”，王安石《诗经新义》不用毛传，解作：“剥者，剥其皮而进之，所以养老也。”后在钟山，至一民家，问翁所在，答曰：“去剥枣。”公悟己非，遂奏上于注文中删去十三字。

二、促进语文规范

语文必须规范，才能更好地发挥其交际功能，从而推动社会的发展。

就汉字而言，规范化任务艰巨。首先，必须继续研究简化汉字和整理异体字；其次，要逐步建立汉字使用上的各种规范，如对汉字的偏旁名称、书写笔顺、部首归类以及常用字表都应有一个全国统一的确切不移的规定；再次，还要为信息处理制订有关标准，如已经颁布的国家标准《信息交换用汉字编码字符集·基本集》及其辅助集和国家

标准《信息交换用汉字属性字典》等等。所有这些工作，离开了文字研究工作是难以想象的。如想进一步推动文字改革，乃至逐步创造条件，使汉字实现拼音化，那就更要付出长期的艰辛劳动，用活生生的事实来说服人、教育人，用科学真理来促进文改事业的发展。比如说，如何区别同音词、词儿连写等等问题不解决，那么拼音化终归是“化”不成的。

目前社会上用字混乱，错别字、苟简字触目皆是，省以上电台、电视台，读音错误也不少见，尤其是业经废止的繁体字、异体字泛滥成灾。有人“反思”文改工作，连对汉字简化也泼了脏水，并认为这给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造成了不必要的麻烦。

一方面，对这些现象不必大惊小怪，这都是古已有之，最多不过是于今为烈罢了。实际上文字是人人要用的利器，同时人人也都是苍颉，随时都在改字、造字。开始只在他身边流传，也许其中的多数终身湮没无闻，但也会有些字在流传中得到社会公认，于是跻身新体字范畴，公然直登大雅之堂。另一方面，社会是否对这些现象只能采取消极态度、听其放任自流呢？不是这样。为了社会的更快发展，为了交际、交流工作不致受阻，社会总是在一定时候，或由群众团体出面，或由政府机关出面，对社会用字情况加以整顿和规范。从秦始皇到毛泽东，人们都是这样做的。汉字自从产生之日起，就无时不在变化之中，变化一阵，规范一阵，再变化，再规范，永无穷期。因而没有必要对建国后的简化汉字等工作抱着反感、偏恶的态度，汉字简化之前的形体并不就是至高无上的全能上帝，神圣不可侵犯。它们是由更古老的汉字变化而来，它们也必将不断变化为新一代的汉字。2 235 个简化汉字为我们的日常工作和学习带来了偌大方便，尤其是为我们的亿万学童提供了偌大方便。当然港澳台同胞要照顾，海外侨胞也要照顾，《人民日报·海外版》开辟一个繁简汉字对照栏就是了。他们要回来探亲或居留怎么办？很简单，“入乡随俗”，学会简化字就是了，一亿人总归要服从十二亿人，况且简化汉字的方便他们也有享用的权利。

总之，学一点文字学，对有关文字问题的审视就会站得高些、看得远些，就会更加冷静、客观地审时度势，顺应潮流，把我们的语文规范大业推向健康发展的新阶段。

三、促进语言史研究

自古迄今，汉字的使用一脉相承、从未间断，汉字字书也代有编纂，其中相当一个部分也都保存下来，因而就代代相传的汉字形、声、义三部分考证汉语的文字（狭义）、语音和词汇的历史，当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但对这个问题不可能铺开叙述，这里只打算从一个特殊的角度来举例说明一下，即通过偏旁分析来探究上古音。

上古音研究，一般分韵部和声母两部分来进行。韵部研究的主要依据是先秦韵文如诗经、楚辞等，看其用韵情况可定其是否同部或合韵种种关系，而后离析“唐韵”（实是《广韵》），当合者合，当分者分。话是这样说，实际操作中还会碰到一些困难，即诗、骚、散文中的韵字，毕竟只占少数，另外多数字如何处理呢？还有虽属入韵字，而仍有若干组韵字无法串联归类，怎么办呢？段玉裁根据他对《说文解字》的精深研究，提出了“同声必同部”的重要原则，段氏说：“一声可谐万字，万字而必同部。同声必同部，明乎此而部分、音变、平入之相配、四声之今古不同，皆可得矣。”（《六书音韵表·表一·古谐声说》）。根据这一发现，人们研究《说文解字》的谐声系统，所获上古音韵部区分的结论，与归纳诗骚韵例的结果基本一致而又有互补之处。从这两个不同来源的材料得到一个大体一致的共同结论，这就说明前人的上古音韵部系统的研究是合乎实际的，是科学可信的。

对声母系统的研究没有这么好的条件，因为它完全失去诗文用韵的依靠，那就只有靠古籍中的异文、通假、音训等现象展转相求，而偏旁分析仍不失为一个重要方法。如邦、蚌、捧、蓬均读重唇（双唇），但皆从丰声，丰读轻唇（唇齿）；否罌读轻唇，从不得声，不读重唇；问、闻读轻唇，从门得声，而门读重唇。同一声符字轻重唇间读者尤多，只举一例：

甫

辅脯黼莆蒲哺铺圃逋專

傅缚敷博膊搏溥

薄

礴

这种现象不是个别的、偶然的，而是大量的、系统的，它说明什么问题呢？它说明上古音声母系统中轻唇、重唇不分。如果再参以其他材料还可以进一步看出：“古无轻唇音”（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说）

四、促进社会史、文化史研究

文字是语言的代用品。代代相传的书面材料是所谓文献语言，是社会历史、文化的载体，我们据而可以了解社会历史、文化的变迁，这是很自然的道理。但我们在这里不是谈这个问题，我们所说的，是文字本身形、音、义的发生和变迁，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社会史、文化史的发展和变迁，因而文字学的研究，不能不有助于社会史、文化史的研究。举例来说：

例一：

《说文》：“宰 罪人在屋下执事者 从宀，从辛，辛、罪也。”

《说文》：“臣 牵也，事君也；象屈服之形。”

《说文》：“宦 仕也；从宀，从臣。”

按这是“宰”字的本义，其初当为家内奴隶，与大田奴隶之“众”（甲文从日下有众，小篆日字讹为四形，是为繁体众字）同一身份而境遇较优。因从事家务役作而多接近主人之机，后遂跻身于佣仆之首若管家者然。今存文献中宰多作宰执义，俨然一达官矣，本义遂湮。臣、宦之字亦同，按《国语·越语》：“与范蠡入宦于吴。”韦注：“宦，为臣隶也。”

这是从《说文》所释本义来看古代宰执臣宦的由来。

例二：

尸，古文字与“人”字形较近，以其下肢较为弯曲为二者之别。尸象屈膝蹲踞之形，蹲踞与箕踞不同。

《说文》：“居蹲也。”

段注：“凡今人蹲踞字古只作居……足底着地，而下臀、耸其膝曰蹲……原壤‘夷’俟，谓蹲踞而俟、不出迎也。若箕踞则臀着席而伸其脚于前。”

夷人多为蹲居，与中原之跪坐启处不同，故称之为尸人。尸复假夷为之，故蹲踞之夷或加足旁，而尸则借为尸下从死之字（以上取《甲骨文字典》说）

这是从人、尸字形的不同来辨古代华夷风习之别。

例三：

姓，《说文》：“姓：人所生也。古之神圣母感天而生子，故称天子。从女从生，生亦声。《春秋传》曰：‘天子因生以赐姓’。”

《左传》释文：“女生曰姓。”

按《说文》训解稍迂曲，似不如《左传》释文直截了当。上古时代杂居群婚，人知有母而不知其父，母系社会正以一母所生之血亲关系为基础，因而所谓姓也者，实指同一母系氏族集团而言，故三代著姓若姜若姬若嬴若姚，其字莫不从女。后世又有“氏”，甲文象人手提物之形，当为“提”之初文（取《甲骨文简明词典》说）。氏族之氏，当由提举本义引申而来。顾炎武《原姓》略谓：氏焉者，类族也，贵贵也。公孙之子，以王父字若谥若邑若官为氏；男子称氏，女子称姓。氏一再传而可变，姓千万年而不变。这样看来，“氏”字已是父系社会的产物了。自秦以后，以氏为姓，以姓称男，于是姓氏无别，这就将母系社会的这段历史陈迹一扫而空，只在文字这块历史化石中还留存些许残迹。

例四：

妻，甲文象手执长发妇女形。上古有抢婚之俗，甲文妻字即其真

实反映。《说文》：“妻：妇与夫齐者也，从女，从中，从又，又持事，妻职也。”《说文》所反映的已是封建社会的观念，妻子在宗法上取得了与丈夫表面平等的地位，但又以“持事”为妻职，实则为家内奴隶之总管而已（《说文》据小篆说形不确，“从中”之“中”实为女发之象形也）

例五：

有时候只消看一看一个字的变体，马上可以大体判断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比如一个“碗”字，《说文》有其字而从皿宛省声，“小孟也”；这是个常用器皿，故从皿。字亦从木宛声，说明最早是用木制。又从瓦宛省声，这就改成陶器。今作碗，从石，玉石一类，这已该是瓷器了。

第二节 汉字和汉语

语言，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它同人类社会一道成长和发展，迄今已有上百万年的历史。

文字，是有声语言最重要的代用符号，但并不是所有语言都有自己的文字，最古老的文字也只有三五千年的历史。

文字对语言并没有天然隶属的关系。有的语言，其文字迭经变更，如越语原先直接使用汉字，从 14 世纪的陈朝开始曾陆续并行使用过汉字越南化的“字喃”，如今则使用拉丁化的“国语字”（传猥樓魁，*Truyện Con Trau' Bay'*，关于一头飞走的牛的故事）。有的语言，同时使用着两三套文字符号，如日语中的汉字以及假名字母和“日本式罗马字”（味の素，*Aji No Moto* 味精）但这样说绝不意味着某一语言选定某一文字是随心所欲的，由某一文字转换到另一文字是轻而易举的。对那些不同体系的文字符号系统而言，对那些使用人口众多、地域辽阔、历史悠久的文字而言，就更是如此。

一般认为，文字起源于图画，经历了一个由实体而轮廓而线条的过程。但文字同图画有一个本质区别：文字总是代表着语言中的某一成分（词或语素或音节或音位），它们之间存在着严格规定的确切不移的对应关系。正是透过这层对应关系，人们才能利用文字来交际。图画则不然，不管它描绘得多么细致逼真，不管它的图形激起人们多么一致的共鸣，它也不是文字，因为它主要通过图形来表义，图画是超语言的、非语言的。《左传·宣公三年》：“王孙满曰：‘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这著名的九尊禹鼎后来成为传世之珍，但从来没有人认为那是中国最早的文字。

人类文明早期的文字都是表意的，一方面，它们代表着某一语言的某一成分，另一方面，它们极富图绘性、直观性。由于语言特征的不同以及社会文化条件的差异，这些古老文字后来逐渐分化为表音和表意两大文字体系，我们的汉字就正是表意文字的杰出代表。

目前所见最古老的汉字是殷商武丁时代以来的甲骨文，迄今已有 3 300 年历史。3000 多年以来，汉字的使用一脉相承、从未间断，就其

表意体系和六书结构而言，甲骨文同今天使用的汉字没有什么两样，这在世界文字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一例。汉字之所以能够达到源远流长、历劫不衰的地步，其首要原因当是它同汉语的性质基本契合。汉语的性质，我们认为，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汉语基本上是一种单音节的、积木式的综合表义的语言。

一、汉语基本是单音节语

请看下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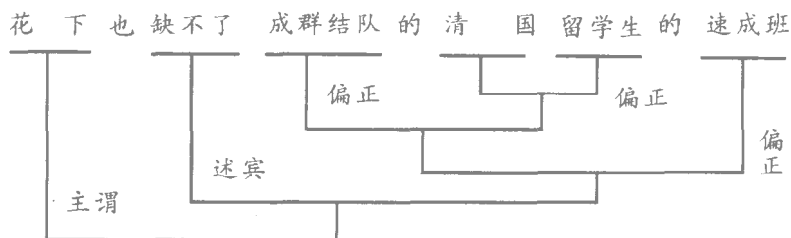
书名	单音词		复音词	
	词数 (%)	词次 (%)	词数 (%)	词次 (%)
论语	1120 (70%)	12766 (90%)	473 (30%)	1431 (10%)
孟子	1559 (65%)	28814 (90%)	832 (35%)	3061 (10%)
韩子	2383 (49%)	83737 (89%)	2524 (51%)	10871 (11%)
现代汉语	3751 (12%)	845356 (64%)	27408 (88%)	469048 (36%)

（现代汉语数字来源：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现代汉语频率词典》附录三“各类语料所含不同音节词词数及词次统计”；转引时略有归并，另舍去小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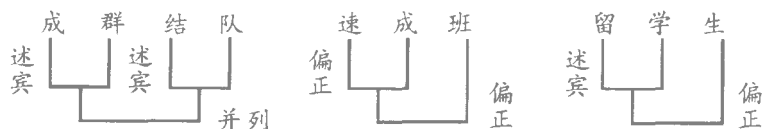
人们常说，现代汉语中复音词（尤其是双音节词）占优势，甚至是绝对优势。单从汉语词汇中复音词的绝对数来看，确实如此。但能否因此就否定汉语是单音节语的性质呢？显然不能。从上表可见，即使在现代汉语，约占总数 12% 的单音词，其使用频率竟高达 64%，也是个绝对优势。只要想一想这两个百分比，现代汉语单音词的活动能力和重要程度也就不言而喻。其次，现代汉语中的复音词也都是单音语素组成的，而这单音语素同单音节词的界限有时则不是那么分明，也就是说，某些所谓的复音词其实只不过是些固定词组而已。

二、汉语结构是积木式的

汉语的单音语素经常就是一个单音词，它可以很容易地组成双音词或词组，然后再由这些单音的双音的语素、词以及词组堆砌出更高级的词组、句子和话语。如果说单音语素如同砖瓦木石，我们多半是利用它们首先造出各式各样的若干预制件，然后再利用这些预制件造出一幢又一幢鬼斧神工的“参天大厦”。汉语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这种结构上的层层叠加，一个不算复杂的话语分析出五六个层次不足为奇，例如：



如对成语和单词进一步切分，还可以再深入两个层次，如：



但层次虽多，基本平面却只有三个：一是词法平面（这属语言范畴），一是句法平面（这属言语范畴），还有一个是词组平面（功能上应属词法平面，结构上应属句法平面，似属语言——言语范畴），而这词组平面本身却又是多层次的。令人惊奇的是，汉语这三个平面的组织原则和结构模式又几乎一模一样，汉语的复杂性和单纯性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人们还注意到，古代汉语的句法结构往往也就是现代汉语的词法结构，它形成现代汉语的深层结构，经过不止一次的堆砌、叠加，最后形成现代汉语的表层结构，亦即现代汉语的句法结构。从而可以断言，汉语三个平面结构上的相似性并非出于偶然，而是由于它们之间存在着一脉相承的祖孙关系。一个胚胎的发育史正好是一个物种的进化史，一句话语的发育史正好是语言结构的进化史。

三、汉语具有综合表义的功能

语词往往是多义的，最常用词往往也就是最多义词（想一想汉语“打”字吧），这在古今中外都是一样的。但不同于印欧语系的语言，汉语语词本身没有或少有什么标志和变化，就是这么一个赤条条、光秃秃的单音词，而且横竖都一样，也就是说，在任何语境中，在任何时代里，都是这个样。近年来人所艳称的“子、儿、头”三个名词性后缀，在适当的上下文中是时有时无的；“了、着、过”三个动词性词尾，有的语文学家（例如陈望道先生）就认为不过是提带复合谓语的一种，并无特殊之处；有人试验过儿化字小写于中心语素右下方，也由于无用兼丑陋而作罢……

汉语缺乏形态变化，但有丰富而一贯的词法、句法系统来补充，这同印欧语之间并无高低贵贱之可言。汉语语词，单独地看，真不知道它到底什么身份、什么用场。“油”是什么？不知道。“过节每人一斤油”这是指食用油；“车要加油上水”这是指燃料油；“这扇门去年油过一次”这是指用桐油、油漆涂抹；“衣服油了”这是指被不知什么油弄脏；“这个人油得很”，是说这人颇油滑；近年来又添一解：“这人划船很油”是说此公于划船一道技艺颇精熟。“母亲扶着女儿”，什么意思？有不同解释。可是，“母亲扶着女儿，流着泪把她送上火车”，意思就清楚了；“母亲扶着女儿，靠着孩子瘦小的身躯一步步挨到了医院”，意思也清楚了。“爸爸要开刀”，什么意思，说不准。可是，“医生说了，爸爸要开刀”意思就清楚了；“医院里来了个急诊病号，爸爸要开刀，不回家吃饭了”，意思也清楚了。

古代汉语修辞学喜欢讲“美恶不嫌同辞”，说穿了，也不过就是汉语综合语特色的一个具体体现罢了。例如：《诗·大雅·卷阿》：“伴奂尔游矣，优游尔休矣。”伴奂犹盘桓，优游自得之貌。《周颂·访落》：“将予就之，继犹判涣。”判涣犹伴奂，在此为徘徊不进之貌。《伪古文尚书·泰誓中》：“受有亿兆夷人，离心离德，予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乱臣，贤能之臣也。《管子·君臣下》：“君为倒君，臣为乱臣。”《孟子·滕文公下》：“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乱臣，作乱之臣也。

这就说明，汉语固然重视一字一句的推敲，但更加重视其整体性和综合性。一方面，汉语的字词语句具备着相当的灵活性、可塑性，

另一方面，汉语的篇章段落保证了必需的完整性、精确性，汉语就是这样一种灵活而又确定、模糊而又清晰的语言。

综上所述，缺乏形态变化的单音节语乃是汉语最本质的特征。由于单音节词语不可能满足日常交际中大量词汇的需要，它就转而通过精巧而又单纯的积木式构词法和造句法来取得平衡；由于是单音节语而又缺乏形态变化，它就通过词语句段乃至篇章结构的综合表义来取得平衡。

四、方块汉字同汉语基本契合

现在回过头来谈我们的汉字。前面已经提到，汉字属于表意文字体系。说得准确一点，汉字在古代汉语中原是一种表词文字（在少数情况下只表示一个语素甚至音节），在现代汉语里是一种语素文字（有时也可以表词或只表示一个音节），概括而言，汉字主要是一种语素文字。这就是说，汉字的每一个形体结构之中既包藏着一个单音节读音，又昭示着一个或概括或具体的意义，汉字是形、音、义三者的统一体。

这种文字特别适合于表述缺乏形态变化的单音节语，不但书面上的一个个方块字同口语里的一个个单音词一一吻合，而且在缺乏说话时声容情态配合的条件下，可以通过文字不同的形体结构来得到补偿，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汉字的区别同音语素的功用。按新《辞海》做一项统计，它共收 11834 字，现代汉语共有 1332 个音节（合声、韵、调的不同而言）平均一个音节包括了 8.9 个同音汉字（不同语素），最多的 *yi* 音节竟包括了多达 149 个同音汉字（不同语素）。若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信息交换用汉字编码字符集基本集（GB2312-80）》所收计算，共 6763 字，一个音节的平均载字量也有 5 个，*yi* 音节则仍有同音字 60 个。如今这些不同的语素都借同音不同形的汉字区别开来了。单音语素（或词）如此，双音词如何呢？同音现象也颇普遍。按张志公先生主编《现代汉语》附录十四“常用同音词举例”统计，现代汉语中常用双音同音词两同的共 365 组，三同的 13 组，四同的也有 1 组，兹录其三同、四同者共 14 组示例：

回声——回生——回升 油船——邮船——游船

陆路——碌碌——辘辘	油箱——邮箱——游乡
情意——情谊——情义	有益——有意——友谊
全力——权力——权利	月历——月利——阅历
人士——人事——人世	战栗——战例——站立
示意——适意——释义	正式——政事——正事——正视
异义——异议——意义	中心——忠心——衷心

不用再说，这些个同音词也都由不同的汉字形体分别出来了。

方块汉字表述语言的积木式结构也颇方便，大小由之，长短随便。只要语义允许，修辞合适。为了对仗工稳，音律谐和，一个双音词或词组可以缩减为单音，一个单音词也可以扩展为一个双音词或词组，即使一般认为不可分拆的叠音词、联绵词也不例外，郭绍虞先生把这称之为“中国语词的弹性作用”，并且举了大量例证，我们且来摘引几则：

欧阳修《醉翁亭记》：“太守与客来饮于此”，觥筹交错，坐起而喧哗者众，宾欢也。”其中“客”、“宾”为两个单音词，但在“太守归而宾客从也”句中，“宾客”显然是一个双音词。又如：谢瞻《张子房诗》“王风哀以思，周道荡无章”，即用毛诗序“厉王无道，天下荡荡无纲纪文章”之语；鲍延之《秋胡诗》“燕居未及好，良人顾有违”，即用毛诗“或燕燕居息”之语，又《还至梁城作》“曷为久游客，忧念坐自殷”，亦出于毛诗“忧心殷殷”之语，这在李善注中都已举出。然则所谓荡者，荡荡也；燕者，燕燕也；殷者，殷殷也。又如：“於乎”为叠韵联绵词，而《诗·大雅·文王》篇“於昭于天”，单用“於”字；“犹豫”为双声联绵词，而《楚辞·九章》“壹心而不豫兮”，单用“豫”字；“玄黄”为双声联绵词，《诗·周南·卷耳》正作“我马玄黄”，而《诗·小雅》“何草不黄”；“何草不玄”，单用“黄”或“玄”字（《中国语词之弹性作用》收入《照隅室语言文字论集》）。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形成了汉文学所独具的对仗和通篇对仗的骈文。这固然主要由于汉语的单音节特质所致（易于叠加或递减），同时也由于方块汉字如实地反映了这一特质，从而可以通过加加减减的协调，造成长短一律、形式匀整的“文字型文学”来。

五、方块汉字的不足

我们强调汉字对汉语的适应性、匹配性，但并不否认汉字难认、难记、难写以及难于实现机械化、电子化操作的弊端。刘泽先在《汉字好学吗》（原载《语文现代化》1985年第8辑）一文中曾经论证过汉字难学的问题：在现状对比方面，新中国成立初期就有人指出，我国儿童不得不费6年时间才能学完的小学课程，使用拼音文字的越南或音节文字的朝鲜儿童只要念4年。50年代，人民教育出版社把苏联小学4年所用的语文《阅读课本》（全四册）全部翻译出来，印刷字数为92万字。当时我们小学头4年的语文课本只有12.5万字，只相当于人家的1/7。70年代的小学头4年的语文课本，更减至8.3万字，只相当于人家的1/10，差距更大了。日本是既使用汉字、又使用拼音文字（假名和日语罗马字）的国家，保科孝一经过调查研究后指出：使用汉字教学的日本小学每周平均有11.5小时的语文课，6年之间只能学到8000个词儿，一个儿童每记忆100个词儿平均要费4.5小时的时间。这样的语文教学效果只等于使用拼音文字的欧美各国的1/7到1/15。岩村清一也说：德国小学教科书的内容是使用汉字的日本教科书的6倍。使用拼音文字各国，儿童受初等教育一年半就能看书，以后就读书扩大知识，进一步增加阅读能力，而日本儿童读完4~5年的小学课程还没有很充分的读书能力。

20世纪50年代以后，计算机的飞跃发展使人类社会进入第二次工业革命，它把人类从繁重的脑力劳动中解放出来。由于这次工业革命是通过计算机信息处理来提高脑力的劳动效率，人们把这个正在兴起的新时代叫做信息时代。由于计算机通过处理各种符号、包括语文符号的方法来进行信息处理，使用拼音文字的国家能够比较顺利地进行这次新的工业革命，从生产的飞跃发展中得到巨大的好处。由使用印欧语言的西方国家所设计的硬件或软件，对汉字的特殊需要根本不予考虑或很少考虑，这就给我们的引进吸收工作带来了困难，至少是延宕了时间。另一方面，汉字符号太多，难于输入，往往需要使用封闭性的数字或字母或数字加字母的办法进行编码输入，这一般需要专业人士或通过一段时间专门学习的人员才能操作。近年来，许多人已经设计出不下千种的字形、字音、音形编码，人们笑谈这是个“万码奔

腾”的局面，使人有编码容易找码难的感慨。这种种客观情况不能不给国人学习和掌握先进的电脑技术增加了难度。

总之，方块汉字属表意文字体系，它同缺乏形态变化的单音节汉语的性质基本契合。作为地球上使用人口最多的书面交际工具，它有着巨大的不可或缺的现实功用；作为三千多年炎黄文化的载体，它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另一方面，方块汉字难认、难记、难写，并且难于进行机械化、电子化操作，这又颇难适应现代社会的飞跃发展。方块汉字必须改革，汉字改革必须坚持积极而又慎重的方针。